

国际变局下日本经济外交的 战略性调整论析 ——基于“地缘经济学”的分析视点

吴怀中 从伊宁

[摘要] 近年来,面对国际政治环境的复杂变局,日本不断增进其外交政策的“战略主体性”色彩,其中加强经济外交的战略性调整成为重要举措环节。此种战略调整动态,高度体现于区域经贸、对美协调和对外援助的经济外交支柱性政策领域。从学理视角而言,则可视之为政府决策层在对外政策行为中,深度强化以“经济权力手段运用”及“国家利益目的意图”为内核的“地缘经济学”思维指向。具体到战略调整的政策性特征上:在地区合作层面,日本区域经贸政策从初始“开放包容”理念加速转向“集团阵营化”形态;在对美经济协调层面,将政策重心从贸易论争调整至重要战略物资领域的经济安全合作;在对外援助政策层面,从侧向实现潜在政治战略意图变革至直接服务军事目的的安全战略需要。日本积极筹谋、经略经济外交多重战略调整,其动因意图在于使之有效服务于集政治、安全、经济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利益诉求。但此种带有强战略性倾向的对外经济政策,在部署推进中亦同步面临国际社会认同、合作利益分歧等“多重制约”,并进一步冲击位居“低谷”的中日关系。复杂变局中,日本应自觉纠正对外经济政策中的“武器化”理念倾向,与中方一道共同致力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双边关系。

[关键词] 经济外交;地缘经济学;区域合作;经济安全;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5.04.004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5)04-0059-(17)

[收稿日期] 2025-03-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CGJ051)

[作者简介] 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7);从伊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广义下的经济外交一般被视作“在对外政策领域,国家为实现本国在经济层面上的诸多利益,尽可能动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进行对外交涉与协调的一种政策样式”,^[1]即主要特质

为重点服务于国家经济利益的对外经济政策。但受到特定历史原因等因素影响,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发展演进中,不断被施以追求政治及安全利益的战略内涵,“战略化运作”成为贯穿至今的日本经济外交转型变革的“主旋律”。特别是进入安倍二次执政时期后,日本对外经济政策所包含的推动国家战略转型、着力地缘政治拼争的工具性指向更为深化增强。

经济外交是中国学界考察日本外交政策的重点研究议题对象,其中经济外交内容中所蕴含的“战略化”倾向,更是重点分析的问题视点之一,相关成果不胜枚举。^[2]但相关问题研究,仍存有以下待充实及挖掘的探究空间:第一,研究问题设置更多关注于日本经济外交的其中一项政策,例如专项探讨日本的 ODA 战略或区域经济合作。但如果仅注重日本经济外交的一个“政策性方面”,可能难以充分把握单项政策调整背后实际折射出整体经济外交路线战略转向的本质与内涵。第二,相关问题研究考察视点大部分集中于冷战结束后、21 世纪初期 10 年以及安倍二次长期执政的中前期时段,缺乏从国际政治变局的宏观视角审视安倍二次执政时期以后及近年来国际环境加速激变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持续深化战略性调整所带来政策特征变化的跟进性研究。

第三,从国际关系学理性而言,国际变局下日本经济外交的战略性调整深化,本质上属于外交政策过程中决策层基于“外部压力”的传导逻辑,确定自身决策偏好意向,进而在外交决策中做出相应调整变化的一种对外政策行为体现,但目前中国国内学界较少从理论视角深度分析日本对外经济议题领域中加强战略考量的驱使因素及目标意图设定;此外,既有研究也鲜有运用理论工具系统分析“外部环境变局”与“经济外交战略调整政策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呈现。因此,基于现有论著成果的不足性所在,对于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环节加强战略调整的问题考察研究,笔者旨在引入“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的理论分析工具,整合“地经学”中所包含的“经济权力行使”与“国家利益目的”的学理视点,在回顾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多项支柱性政策渐进施行“战略化”转向的历史沿革基础上,细致论析当前日本经济外交在区域经贸、对美协调、对外援助等政策领域综合推进战略调整深化的政策特征体现;进而结合“国家利益包摄要素及目标设定”的理论视点,逐层分析决策层决定实施相应对外政策行为的深层动因逻辑;最后对日本经济外交深化战略调整面临的制约因素及潜在对华政治影响进行简析与评估。

一、分析视点:“地缘经济学”的范式引入

与“地缘政治学”强调在特定地缘版图范围,通过军事等“硬权力”的竞争手段实现国家安全与政治意图的战略目的相比,“地缘经济学”更加侧重运用经济权力的政策手段,服务行为体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地缘战略目标。而日本经济外交的“战略化”转型沿革与“战略性”政策调整深化,恰为“地缘经济学”的观点范式提供了可证校验的事实案例。“地缘经济”概念中所包含的“经济权力行使”与“国家利益目标”的学理视点,亦可为深度探析日本经济外交政策行为变化的动因逻辑提供相应的理论分析工具。

(一)“地缘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地缘经济学”的相关逻辑表述,最早由美国战略派学者卢克·沃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

出。沃特认为,两极格局瓦解后,国家间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的战略与权力竞争从传统军事领域加速转向经济议题领域,“国际经济”与“地缘政治”日益呈现紧密关联状态,而符合此种模式的任何战略竞争均可称之为“地缘经济学”。^[3]在沃特表述中,地缘环境、经济权力与目标意图构成“地缘经济”的核心要素组成。沃特虽然阐释了何种权力竞争的方式变化归属“地缘经济”的理念范畴,却并没有对“地缘经济”的概念做出明确的定义解释。

罗伯特·布莱克维尔和詹妮弗·哈里斯于2016年出版的专著《地缘经济学与治国方略——另一种战争形式》,可视之为“地缘经济学”理论建构初步成型的集大成作。在该论著中罗伯特与詹妮弗借引“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分析方法,用以解释国家在地缘因素变量作用下的国际政治行为”以及“治国方略(statecraft)以手段为属性导向”的理论观点,将“地缘经济学”概念详细定义为“一是运用经济手段促进和捍卫国家利益,并产生有利于国家自身的地缘政治结果;二是其他国家的经济行动对一个国家地缘政治目标的影响。”^[4]此种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地缘经济学”概念指涉与含义理解的“模糊状态”。

在本文的论述分析中,笔者更倾向于采纳上述定义的前半部分内容,即将“地缘经济”视为“通过经济手段服务国家自身利益与地缘政治目标”的政策行为。较之后半部分内容,这一概念指涉强调“地缘经济学”是国家基于自身战略目标行使对外经济政策的一种主动筹谋与经略,更加贴近当前日本经济外交增进自身“战略主体性”、日益深化服务总体国家战略转型功能需要的经验事实写照。^{①[5]}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经济手段”与“国家利益目标”构成“地缘经济学”概念内容的核心要素。因此,如何理解“地缘经济学”概念成立的理论基础,首先需要从学理视角辨析两方面问题:一是国家权力的“经济面”存在;二是国家利益目标的具体指涉以及影响因素。

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方面组成,“经济权力”在国家对外政策推进过程中同样具有可影响本国战略决策或服务本国战略需求的能动作用属性。尽管传统权力政治思维下,国际关系学界倾向从军事安全的“高政治”维度思考国际政治中国家的权力争夺问题,但即便是摩根索、米尔斯海默等“强现实主义者”,也曾强调指出自然资源、财政收入、技术实力等经济议题对国家对外政策决策及军事实力建设的能动作用施展。^[6]1988年,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提出“结构性权力”概念,认为国家间权力竞争的着眼点在于能够决定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结构性权力”,具体权力内容包括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方面。^[7]

在“地缘经济学”的初始概念中,“国家利益目标”与“地缘政治目标”均被视为“地缘经济”行为的战略动机。但基于“战略论”视点,二者亦可处于一种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统合性关系。国家行使国际战略的总体目标是维护整体国家利益,而国际战略运作模式又包含地缘战略,因此国家地缘政治目标归属于国际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被包含在国家利益目标之中。^[8]从国家利益具体指涉的概念本身而言,其作为一种“加权指数”,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多个方面。^[9]从国家利益认知的影响因素而言,现实主义主张的以“内外政治环境变

① 例如日本政治学者河合正弘将“地缘经济学”解读为“国家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国家地缘政治层面目标的方式”。

化”为代表的“物质性因素”驱动,更具经验事实的解释主导力。

(三)运用“地缘经济”视点分析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适用性

“地缘经济”的理论工具,高度适用于分析日本经济外交转型沿革与深化战略性调整的特征表现与动因逻辑。从历史视角而言,尽管面临因特定历史原因导致的对外政策手段限制,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总体推进发展,确实证明了优先推行经济事项是日本在国际舞台强化地缘经济影响力的一种行之有效方式。^[10]从现状分析而言,日本在对外经济领域的支柱性政策环节,深化带有战略意图的政策调整倾向,从经验事实层面进一步印证了“国家权力的经济面包含,以及经济权力自身带有能动作用属性”的学理观点。从动机分析来看,“地缘经济学”强调政策行为的动机根源在于“国家利益目标”,而基于“具体指涉”及“影响因素”的“国家利益论”视角,笔者可借鉴“层析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各自目的层面,系统分层论析国际变局环境下日本经济外交加速战略调整的深层动因逻辑。

二、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三项支柱性政策 ——“地缘经济”理念的暗含与实践

在展开论析当前日本经济外交深化战略调整的特征性表现之前,需要对战后日本经济外交重点政策议题的发展演进进行梳理与回顾。在归属于经济外交的支柱性政策选取上,笔者将考察视野重点放置于区域经贸、对美协调与对外援助三个方面。^①通过对三项政策内容沿革的简要梳理,以把握战后日本经济外交“非单纯服务于经济目标”的转型变革脉络,及对外政策推进中“地缘经济”理念的暗含体现与实践进程。

(一)以开放性、包容性为特征的区域经贸政策

根据“软实力”理论,对国际制度规则制定的影响力程度将会对国家提升自身国际实力地位起到加持积淀作用。^[11]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并于1962年解除“协定第35条限制”从而获取“最惠国”地位待遇,成为日本收获国际认可、重返国际社会的标志性事件。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自身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以及国际经济的“区域化”发展趋势不断增强,日本决策层开始逐步推进以经济规则制定和一体化建设为导向的地区经济政策,自此区域经贸成为日本经济外交布局的重要一环。1978年大平正芳内阁执政后,“促进环太平洋地区合作”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课题。1980年,大平在出访澳大利亚期间首次对外说明其“环太平洋连带合作”的构想轮廓:“在太平洋地区构建新型国家间合作关系,关键在于尊重他国文化特性与政治自立,该地区合作不应带有排他色彩。”^[12]同年11月,以美、日、澳为首的环太平洋11国

^① 划定三项支柱性政策的具体原因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从官方表态而言,日本政府出台的经济外交官方政策文件——《经济外交蓝皮书》中,明确将“基于规则制定的区域经贸政策”视为经济外交政策的支柱组成之一;第二,从历史视角而言,自旧金山媾和完成后,日本以“吉田路线”为指引开启对外经济政策推行,而“对外援助”恰为日本经济外交路线最初的推进重点,并在“战略化”的转型路径中发展至今,“对外援助”不仅开启了日本经济外交的初始进程,同时其变化演进过程也是日本经济外交持续深入推进战略转型的重要政策参照;第三,从同盟体制视角而言,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整体基轴,使得同盟体制规范影响效应不单涵盖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领域,亦包括对外经济政策领域,美日安保条约曾设有专项条款规定“缔约国双方应共同致力于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构筑。”

在堪培拉举办“环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1982年6月该机制被正式更名为“环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1989年,在日本与澳大利亚等国的共同推动下,基于“环太合作构想”及“PECC”的机制性基础,“亚太经合组织”(APEC)正式成立。除促进区域经贸合作的经济意图之外,该时期日本区域经济政策构想同样包含政治层面的战略意图考量。一方面,PECC及APEC成立是日本借助区域经济“建制”,主动参与、塑造基于规则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尝试;另一方面,环太构想也是日本借以地区合作方式,将中国牵引至西方国际社会体系的重要举措。此外,日本在区域合作领域体现开放、包容性理念的多边政策实例还包括1997年初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10+3”会议,和2001年达成的“清迈倡议”。

(二)利益权衡困境下的对美经济协调

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外交基轴,其规范性影响不仅贯穿安全保障政策领域,还包括经济政策领域。在20世纪50~60年代前期,美国允许日本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推动国内经济振兴,美日基轴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外交的直接辐射影响尚不过于突出。

但进入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以后,由于低廉的日本产品大肆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美日贸易逆差日趋扩大,双方贸易摩擦日渐显著。80年代之后,双方贸易纷争进一步扩展至半导体产业领域。美国以“日本产品倾销本国市场”以及“国防产业存在依赖外部配件风险”等因素为由,对日本实施“半导体打压”。由此,日本于1985年和1991年分别签署“美日半导体协定”,解除国内市场保护政策并提升外国半导体制品市场占比份额。在两份协定签署后,大量优质的国外半导体产品进入日本市场,日本半导体产业因市场保护而获取的技术、价格等先发优势不复存在,自此走入持续性衰落进程。

“半导体”纷争,是同盟基轴直接影响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典型案例。日本坚持从传统经济利益层面审视与美半导体争端,但美国出于维持产业竞争力和安全保障风险等因素考量,执意将该问题“政治化”。谈判过程中,通产省虽然想极力维护日本的经济利益需求,但考虑到纷争加剧恐影响美日安保体制关系,在经济与安全利益的权衡困境下,不得不主动对美进行妥协。^[13]此后,贸易纷争作为双方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议题,一直延续到奥巴马政权时期和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

(三)潜在战略意图的对外援助政策

“对外援助”是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另一支柱性组成,起始于1952年“旧金山会议”后日本对东南亚地区推行的“赔偿外交”,并以“政府开发援助”(ODA)为最主要表现形式。ODA的最初宗旨是致力于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进步、自主努力及民生福祉提升的专项支援政策,^[1]但回顾其战后整体发展演进过程,在经济层面意图基础之上,相关政策目标也日益融入政治、安全领域的战略意图考虑。特别是进入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后,大平内阁、铃木内阁及中曾根内阁日渐加强对外援助政策的政治性功能指向。^[14]

此种战略性的趋势变化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7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对于日本将东南亚打造成消化本国出口倾销地等一系列“经济殖民”行径,日趋不满,为改善东南亚地区对日负面印象,彰显负责任的经济大国形象,日本需谨慎思考其对外援助政策的实施方向;第二,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西方国家在财政吃紧背景下,在国际援助领域的投入程度逐渐收

缩,这给予日本借助加大资金投入以强化“战略意图指向型”对外援助政策的有利时机;第三,除外部环境促推外,更为重要的动机仍是来自日本内生的政治战略意图,如“政治大国化”目标追求。进入90年代后,日本对外援助“政治化”转向进一步突出。1992年出台的首份《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中,提出日本ODA应遵循避免军事用途、密切关注发展中国家军事开支、观察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等上述原则,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对ODA施加政治条件。^[15]2003年版《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则借助“增进国民利益”“确保国家安全与繁荣”等表述方式,侧向表达了今后ODA需服务国家利益的政治功能所在。^[16]

三、国际变局下日本经济外交战略性调整的特征性体现 ——经济权力能动作用的施展与强化

近年来,伴随国际政治环境的复杂变局深化,及推动国家战略整体转型的内生动力需要,日本在外交决策部署中加速强化自身的“战略主体性”建设,其中对外经济政策方面,表现为在国际外交舞台中以更为积极、主动筹谋的进取姿态推行经济外交相关施策。由此,日本经济外交也日益呈现出自战后乃至冷战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战略化”特征体现:首先,在经贸规则领域,日渐背离开放、包容合作理念原则,高度融合地缘政治考量,日渐打造区域经贸战略的“集团阵营化”形态;其次,在对美经济协调方面,将政策重心从贸易论争调整至经济安全合作,强调重要战略物资概念,整合投放外交资源与美共同推进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化”建设;最后,在对外援助领域,进一步增进其政治功能的战略意图指向,即在手段方式与目的意图方面淡化单纯经济援助色彩同时持续强化军事要素比重,大力推动对外援助战略的“军事化”转向。

(一) 日益打造区域经贸战略的“集团阵营化”形态

国际环境复杂变局进程下,日本决策层日益深化以“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为导向的区域经贸政策推进。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日渐背离其原有的开放与包容性的多边合作理念原则,强化国际制度与规则制定的战略功能运用。安倍二次执政时期,受“特朗普冲击”直接影响,安倍以首相集权外交决策体制为加持推行官邸主导下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区域经贸战略中主动设置议程、积极倡议、引领并主导CPTPP、日欧EPA等多个高标准经贸规则协定落成,其区域合作理念虽夹杂对华加强制度竞争意图,但尚不排除与中国在多边制度框架下的合作协调。而2020年之后,面对国际形势多重变局,日本在涉及区域经贸的经济外交施策中,高度融入地缘政治的战略色调。虽然日本以“自由贸易旗手”为自居,但更多是以高标准经贸规则为抓手,借助“自由开放”理念说辞,通过在经济框架层面构筑“小多边”“小圈子”等手段方式,极力强化地缘政治维度下的对华经贸战略意图指向,在区域经贸政策实践进程中日益打造,极富“排他性”特征的“集团化”甚至“阵营化”政治形态。

第一,是CPTPP的战略性扩容。CPTPP隶属于日本多领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中的一环,其前身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安倍二次执政时期首相官邸投入巨额政治成本及外交资源艰难推动协定落成,其原因不单在于经济收益考量,还在于CPTPP本身亦担负日本宏大的政治战略意图和兼具安全保障功能的意涵指向。日本进入“后安倍时代”,以积

极吸纳“准同盟”伙伴—英国加入为标志,大力推动 CPTPP 的战略性扩容正是遵循上述政治逻辑的典型实例。继 2021 年 1 月日英 EPA 协定正式生效后,同年 2 月英国政府正式申请加入 CPTPP,2021 年 6 月 CPTPP 委员会决定成立直属工作组负责英国的加盟事宜,日本担任该工作组的组长。在此次委员会发布的部长级声明中,成员国高度赞扬英国在高标准经贸规则确立上的丰富经验和透明公开性,将英国(包括其他潜在加盟国)视为与成员国存在共同利益,共享民主价值的伙伴,作为“市场主义”国家的英国,对其在反对国家介入、贸易保护及非正当贸易限制问题上持有高度的作用期待。^[17]经过 2022 年 7 月工作组会的议程协调及细节谈判后,2023 年 3 月 CPTPP 成员国与英国共同发表部长级声明,该声明指出“CPTPP 成员国确认英国具有实现机制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能力与手段”,^[18]英国自此获准加入 CPTPP。2023 年 7 月,协定内 12 个成员国与英国正式签署加盟议定书,英国正式成为首个来自欧洲的 CPTPP 成员国。

与之相对比,在大力欢迎并支持英国加入 CPTPP 的同时,面对几乎与英国同时期提出加盟申请事宜的中国,日本政府却采取消极、抵制甚至排斥的政治态度。先是菅义伟对外放出言论称“中国在 CPTPP 加盟问题上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之后岸田内阁更是一再利用所谓高标准规则全力反对中国的加盟主张,甚至公开表示“欢迎中国台湾加入 CPTPP。”^[19]

第二,积极参与并引领 IPEF 的实地推进。2022 年 5 月,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高调宣布成立包含美日澳韩及新西兰等 14 国在内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其中“数字贸易经济”“强化供应链弹性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及基建领域合作”和“税收与反腐”被确立为 IPEF 的四大理念支柱。对此,岸田政府不仅表示欢迎,也呼吁参与国应尽早开始建立正式合作机制的议程协商。虽然 IPEF 是由美国主导的多边框架协定,但日本并不甘于在其中沦为“次等”角色,而是在追随美国的同时,突出自身经济外交政策的“战略主体性”色彩,积极在成员国中间承担引领、捏合的关键作用,通过 IPEF 合作大力推动印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版图的“集团化”与“阵营化”趋势打造。

日本的信心来源不单在于美国在东京宣布成立 IPEF 的象征性举动,更来源于自身在推进区域经贸政策层面上的经验优势:第一,数字经贸规则是日本常年致力推动高标准经贸规则建立的重要领域环节,在该领域日本有能力发挥主导甚至领导作用;^[20]第二,日本长期注重以“东南亚”为基点的多边经贸合作,熟谙于在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层面与东南亚的磋商与协调,在经贸政策领域日本有能力充当联通东南亚与美国之间的“沟通桥梁”,帮助美国打消东南亚国家对 IPEF 的摇摆及不确定性认知,在印太经济合作中能够集中并整合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能量。^[21]

(二)深化推进重要战略物资产业供应链的“安全化”建设

国际变局下中美战略竞争加速国际经济事务的“泛安全化”趋势,基于此背景日美两国在对外战略决策中日益突出“经济”“科技”与“国家安全”的一体联动认知,从而使两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协调重点从贸易事项转向经济安全合作领域。反映在日本经济外交的战略部署调整中,即表现为确立并强化“重要战略物资”概念,针对特定战略物资供给,与志同道合国家深化推进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化”建设。虽然在涵盖范围上,日本官方定义了多达 11 项归

属重要战略物资的种类领域,但在对外协调的实地推进中首相官邸将政策重心放置于半导体产业和重要及稀有矿产资源领域。从经济安全视域而言,半导体技术不仅事关民生经济活动也牵涉武器研发等军事敏感领域。^[13]除半导体之外,发光二极管(LED)、太阳能电池等技术的作用及功能属性同样贯穿“经济”与“安全”领域,而制作这些科技产品的原料恰来源于以稀土、锂、石墨、镍为代表的稀有矿产资源。在日本看来,一旦把握住上述重要战略物资的产业链及供应链安全,就等于掌握住了国家护持经济安全的关键及命脉。

第一,在半导体技术领域加强与美战略协作。同盟体制背景下,日本的首要选择便是推动与美国的相应经济外交协调,从理念、机制与实操层面强化日美半导体技术安全合作。在 2021 年 4 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双方发表题为《建设有竞争力·强韧性的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一致表示要在强化技术创新及竞争力的目标指导下,推进双方在包含半导体在内等尖端技术领域的供应链安全及研发能力培育的相互协作。^[22]2022 年 1 月,美日两国借线上首脑会谈时机,就设立“外交+经济”事务的经济版“2+2”会议达成共识,由此美日双方也拥有了围绕经济安全政策议题的正式协调框架。2022 年 7 月,美日两国首度召开经济版“2+2”会议,加强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安全成为此次会议的讨论主题,会谈中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表示“强化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的关键意义,是在涉及敏感且重要的尖端技术领域降低对来自‘敌对国家’的供应依赖。”^[23]同年 12 月,雷蒙多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举行电话会谈,围绕半导体的对华出口管制,雷蒙多提出,希望日本作为共享对华战略的同盟国予以响应,要求日本对华“脱钩断链”。^[24]而为进一步加大并配合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对华技术打压,2023 年 7 月日本经产省基于修改后的《外汇管理法》,在涉及 23 个尖端半导体设备制造的零部件种类领域正式实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

除了双边层次的政策协调外,针对半导体合作议题,日本还积极参与并融入以美国为“轴心”的多边经济安全政策框架,在国际经济安全政策协调中同样借力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小多边”和“阵营化”的政治形态。2021 年 9 月,美日印澳四国举行首次线下首脑峰会,四国一致表示要在半导体等核心技术领域致力构建强韧且多样化的安全供应链条。^[25]而在之后达成 IPEF 协定中,“强化供应链弹性建设”作为其中的支柱性理念设置,预想中的具体多边合作行动领域即为半导体产业。此外,为更加有效利用、整合其东亚盟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的“技术优势”,以进一步在“印太”地区实现对华经济安全层面的规锁围堵,美国更是一再加强对日本、韩国的拉拢诱导,意图打造囊括美日韩在内的“技术安全阵营”。2023 年 8 月,美日韩三国在华盛顿举行三边首脑会谈,针对经济安全保障问题,三国不仅再度声称要积极致力推进包含半导体产业在内的技术安全保障和供应链强韧建设,更涉及具体的政策协调行动方案。在此次《美日韩首脑联合声明》中,三国表示为进一步加强涉及军事领域尖端技术的管制措施,针对美国此前设置的技术作战部队,日韩两国相关部门将展开首次对接性协作,围绕技术安全问题加强紧密合作及信息间共享交流,共同推动三方尖端技术出口管制强化,防止涉及军事专用层域的敏感技术外泄。^[26]

第二,针对重要且稀有矿产资源供应强化国际协调外交。为保障自身在稀有矿产资源供应链的灵活多元性,日本将相应经济外交合作的对象重点放置于美国和澳大利亚。2022 年 6

月,日本加入了由美国组建的包含14个国家在内(包含欧盟)的矿产伙伴关系协议(MSP),该机制名义上寻求强化清洁能源领域的金属及矿物供应链完善,但实际战略指向则是意图在锂、钴、镍、锰、石墨、稀土等重要矿产资源领域减少针对特定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依赖。而近年来日本加力推动与澳大利亚的高层次、多领域“准同盟”伙伴建设,其暗含的战略意图也包括与作为矿产资源大国的澳大利亚,深化推进涉及重要且稀有矿产的供应链战略协作。在2022年10月举行的日澳首脑会谈中,日澳两国就构建“日澳重要矿产伙伴关系”达成协议共识,双方一致表示将通过商业性质的努力,在促进澳大利亚国内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同时,确保对日本在高精尖产业领域所需的重要矿产资源供给。^[27]另一方面,除美澳两国之外,日本还将战略视野投射于同样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蒙古。几乎就在日澳首脑会谈的同一时间,日美两国又与蒙古召开三方会议,在此次会谈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三国确定要共同加强在气候变化、供应链弹性及重要矿产资源领域的相互合作。^[28]除此之外,东南亚地区也是日本积极拉拢的相关议题合作对象,针对东南亚国家稀有矿产的产业及供应链现状,首相官邸曾专门委托省厅进行调研分析。在日本看来,东南亚国家不仅在稀有矿产及金属资源领域拥有储备优势,并且在提炼、加工等配套产业环节同样存有技术优势。例如越南也拥有较为丰厚的稀土资源储备,马来西亚则握有针对稀土的提炼加工技术,印度尼西亚不仅在镍资源上存有储量优势,也掌握相关提纯及冶炼加工技术。^[29]

(三)加力推动对外援助战略的“军事化”转向

冷战结束后,伴随日本对外战略中“政治大国化”理念日益浓重,以ODA为代表的对外援助政策也日渐提升其政治战略的目标诉求。不过,彼时ODA政策中所包含的战略意图和功能性指向更多仍表现于致力国际和平与人类安全保障等“外围层次”的安全事务领域,并以此渐进、侧向实现日本所隐含的政治战略与安全保障的意图考量,并且援助工程不得直接用于军事安全事务,“非军事性”理念禁制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维持。但自安倍二次执政时期以来,受外部环境激变及自身战略认知调整影响,日本决策层不断加强ODA的政治化战略转型进程,并大力推动对外援助战略的“军事化”转向,ODA的战略运用被直接与安全保障的目的意图进行关联捆绑,ODA援助项目逐步染指并突破过往政权设定的“军事领域禁区”。

2015年版《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的修订出台是日本对外援助战略开始实地迈进“军事化”的标志性事件。首先,在“2015版大纲”的前言部分,安倍内阁指出此次政策方针的调整是基于“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合作,对于积极和平主义立场下国家利益维持而言不可或缺”的理念考量,开篇即表明安倍内阁的ODA战略是以致力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外交、安全保障理念为指引。其次,以“致力实现和平安全的国际社会”话术,将援助范围扩展至与安全保障议题密切相关的海洋、宇宙及网络空间等领域。最后,在实施原则上出现重大调整转向,指出在“民生、救灾等非军事领域”ODA项目可直接应用于向他国军事部队提供战略援助,通过模糊“非军事领域”的概念及实施空间从政策实操层面掏空并突破ODA对外军事性质援助的“禁区”。^[30]在运用ODA项目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军事”或“准军事”性战略援助的政策推进环节上,越南是其中的典型实例。先是在2019年6月,日本向越南提供ODA框架下的技术合作援助,援助目的用于强化越南在网络安全领域上的能力建设,以保障“非常时期”下国家拥有对重要基

基础设施实施安全运转的技术支持,相关合作时限长达三年。^[31]之后在2020年7月,日本更是向越南提供高达366亿日元的ODA贷款援助,帮助其海上执法部队建造6艘海上巡逻艇。^[32]越南海上执法权名义上属于越南海警,但海上警察实际隶属于越南海军方面指挥,日本在政策实操中一再强调海上执法部队的援助对象性质,真正意图是将越南海警划归于“非军事领域”的模糊地带,从而使其运用ODA强化越南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政治操作披上合法性外衣。

岸田内阁执政后,在总体继承安倍既定外交安全政策路线的基础上,对外援助战略领域的“军事化”转向更加突进。2022年12月,岸田内阁颁布“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中指出:“在印太构想指引下,为进一步维持、发展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日本要积极推进ODA的战略性运用,在海洋安全保障、法治、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强化针对性的战略支援。”^[33]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在官方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ODA项目适用安全保障领域。“15年版开发大纲”修订出台长达8年之后,2023年8月岸田政府又出台了最新修订版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其中单纯的经济援助色彩被进一步淡化的同时,适用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性意图得到进一步突破与增强。在实施原则上,岸田内阁延续了安倍二次执政时期“非军事领域”战略援助的模糊性概念修饰。但在基本方针上,岸田内阁做出重大调整。在“2015年版开发大纲”中,尽管安倍内阁全力寻求ODA军事化突破,但在基本方针设定中仍坚持“致力于非军事性合作下的和平与繁荣构筑”。与之相对比,岸田内阁修订的“2023年版开发大纲”中,基本方针变更为“致力于贡献和平与繁荣的构筑”,^[34]完全删除了“非军事合作”的前置修饰,表明首相官邸从官方立场层面完全默许甚至认可通过“不排除军事合作”的手段方式强化ODA的战略性运作。此外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早在2023年4月,岸田政府提出并发布“政府安全能力支援”(OSA)概念及政策指导文件。其主要原则与既有ODA形式相区别,旨在强化与志同道合国家在安全保障领域上的相关能力及遏制能力合作建设,日本可通过OSA项目直接向对象合作国实施军事援助。虽然名义上ODA与OSA在各自含义理解上存在非一致性,但OSA实际也是对“始终在军事化援助推进上存有限度困境”的ODA项目的一种重要补充与辅助,二者在政策推进中有可能是相向而行的。^[35]

四、日本经济外交战略性调整的多层动因 ——国家利益目的的分层论析视点

国际变局下,日本经济外交在多个政策环节加强战略调整,日益深化服务国家战略转型的工具性指向,基于国家利益内容及目的的分层论析视点,日本决策层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地缘经济”意图考量的战略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在政治利益层面,基于自身“秩序焦虑”的战略认知,日本意在积极谋求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在安全利益层面,加强经济安全理念认知,实际反映出日本政府寻求以“软硬兼具”方式针对性制衡中国实力崛起;在经济利益层面,面对沉重的国内经济困局,首相官邸也试图借力战略调整进程中经济外交的国际合作开展,促动国内经济的活力增长。

(一)政治利益层面:致力谋求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

复杂国际政治变局中,日本认为疫情冲击与俄乌冲突爆发使得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开放

的战后国际秩序面临重大冲击与动摇,包含东亚在内的“印太地区”是面临此种挑战与震荡的“前线地带”,其背后实质反映出日本无意正视并接受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实力崛起与影响力位阶提升。基于此种强烈的“秩序”维度上的战略焦虑认知,日本在外交决策部署中不断强化“战略主体性”色彩,在国际外交舞台以更为明确的“进取”姿态,积极致力谋求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以保障自身外交战略中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而注重规则的对外经贸政策恰为日本提供了极为理想的工具抓手。

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视域下,作为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则与制度”对当前国际社会中国国家行为体的政治决策具有显著的规范及施动作用影响。在日本看来,通过强化以规则为导向的区域合作政策,在特定地缘政治版图打造具有典型排他性的“集团化”“小多边”“小圈子”的对外经贸政策推行,不仅有利于牵制并稀释中国在区域范围内日益增长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建构并塑造由日本及美国所期望的“可深度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外部政治环境,同时更有助于日本利用“国际规则制定权”从区域及全球层面积极筹谋、获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权地位,在国际外交舞台占据更加主动的优势性位阶。在2022年12月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对于日本区域经贸政策部署,岸田内阁基于政治利益考量从国家战略层面评价指出:“为防止来自特定国家基于经济层面的‘非军事压力’,同时进一步促进印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推动自由、公平、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强化,日本要致力加强相应政策努力,维持CPTPP的高标准经贸规则水准,并推进IPEF框架协定的制度化与机制化建设。”^[33]2023年6月出台的《外交蓝皮书》中,岸田内阁也再度重申强调“日本的区域经贸合作将持续致力于推动以和平、繁荣为基础的自由且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强化。”^[36]

(二)安全利益层面:以“软硬兼具”方式针对性制衡中国实力崛起

国际变局下日本在对外战略设定中日益强化“经济安全”的理念权重,推动半导体及稀有矿产资源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国际供应链“安全化”建设,相关政策部署恰恰也是日本决策层在经济外交推进中持续深化以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目的为导向的“地缘经济思维”的典型印证。“地缘经济学”理论指出,国家推行经济安全政策的关键之一在于主动应对对象国家的意图及目标设定,否则便难以辨析国家的经济安全政策是否类属于“地缘经济学”。^[37]就经验事实而言,特别是结合近年来日本官方政策文件的表述,无论是外交层面还是安全保障层面,中国因素实际已成为日本政府推进外交安全战略政策中最主要、也是最清晰的地缘政治目标及安全利益关切。^①根据现实主义逻辑,当“守成国家”日益感受到来自“崛起国”的安全压力施与时,将会积极采取“追随”与“制衡”的战略手段予以适时应对。日本在对华问题上的安全战略逻辑显然是以“高度制衡”为思维导向,^[38]具体的制衡方式亦可分为突出军事因素的“硬制衡”和侧重经济手段的“软制衡”。而日本所推行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因其同时涵盖“软制衡”手段与“硬制衡”要素,又有其特殊性特征。

从政策表现来看,日本强化并推动的所谓经济安全保障政策,是一种典型的通过“经济手段”推进对华综合战略博弈的“软制衡”方式。从安全战略目标而言,日本的意图不单单是通

^① 特别是在2022年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日本将中国明确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过经济安全政策工具延缓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更包含通过在涉及军事方面的尖端技术管控、封锁等方式手段,针对性地延阻乃至遏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崛起。在联盟框架内部,美日均将中国的技术实力提升视为对自身军事安全利益的重大威胁,基于安全保障层面的共性威胁认知,也驱使两国将对外经济协调的政策重心转至共同实施对华技术遏制的战略联动协调。因此对于日本的经济安保战略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兼具“软性”和“硬性”的制衡方式。

以半导体技术为例,日本著名经济安全政策问题专家、战略派学者铃木一人就曾指出由于半导体的尖端技术应用具有包含“经济”和“军事”的二元功能属性,因此围绕半导体的技术竞争与战略博弈实际上就是关乎国际政治层面的“地缘经济学”问题。^[39]“尖端半导体对于人工智能(AI)、量子计算机等技术发展不可或缺,而这些技术又可直接应用于弹道导弹运行轨迹、战时武器选择配备及后援物资补给配发的计算与推衍工作;一旦日本与志同道合国家一同在尖端半导体供应链合作中针对性的强化对华技术钳制,中国掌握并运用尖端半导体技术的难度将会显著加大,这也就意味着在军事能力上西方将对中国保持明显的军事科技优势,并以此针对性的遏制中国军事实力的崛起。”^[39]

(三)经济利益层面:促动国内经济的活力增长

日本经济外交的政策原点起始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吉田路线的目标是将安全保障依靠于美国的同时,集中资源力量实现国内经济的复兴繁荣,以经济振兴带动国力发展。^[5]尽管当前日本经济外交在政治、安全领域的战略倾向性日渐增强,但也始终没有脱离促动国内经济提振及活力增长的目标性设置。即便是在国家总体战略转型提速的安倍二次执政时期,安倍也曾强调提出其经济外交的政策推进需服务于国家经济的增长战略设定。当然,其中包含国内政治因素的逻辑考量。追求经济增长与福利社会,是自民党传统保守主义的核心内涵,自民党历届政府均把经济议题置于施政首要位置。^[40]而一旦国内经济形势居于下行及低迷趋势,往往首相官邸的执政基础也会同步趋于不稳。因此经济层面的利益需求考量,对首相的经济外交决策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影响。

第一,CPTPP是日本着力推行“集团化”对外经贸战略的主要抓手,但其对日本国内经济提振的作用效应同样不可忽视。早在2015年,日本内阁府就曾根据测算预估得出“TPP的达成签署将对日本国内GDP带来1.5%增长率,并创造46万个劳动就业岗位。”^[41]从之后CPTPP运行历程来看,其对日本国内经济最为直接的拉动作用在于成员国内部关税大幅减免后企业生产投资积极性增强及农产品贸易流通的“活跃化”。对日本企业而言,CPTPP生效后带来的高额关税免除,也就意味着其进出口产品的关税成本同步大幅降低,对其拓展海外市场销路具有重要意义。农产品贸易流通方面,根据2019年的数据统计,CPTPP生效仅一年后,日本面向成员国的牛肉出口额与前年相比提升了19%,成员国面向日本的猪肉和牛肉出口额分别提升8%和3%。^[42]关税减免背景下,日本肉类农产品市场开放性增强,使消费者感受到了肉类农产品价格进一步走低的利益福祉,虽然注重保护主义的日本农业利益团体所面临的竞争压力显著提升,但也有助于其适时推行经济规制改革,通过相应改革措施改善其营商环境,推进经营的效率化增进。^[42]

第二,日本意在通过国际经济安全合作协调带动国内科创领域的技术实力提振。在自民

党出台的经济安全政策报告中,曾专门提及要加强日本在重要战略产业及核心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在国际产业结构中占据先端与前列。^[43]而通过此种包含尖端技术国际协调的战略性政策调整设定,日本也意图借力相应配套的政策性扶持,如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计划制定等方式,推动日本在关键及核心技术研发上的创新力凝聚,借助技术创新带动国内经济出现新的“活力增长点”。从岸田内阁经济外交的推进重点来看,岸田政府在对外经济安全战略中一再强化对美国的“战略跟随”,从经济意图而言,是寻求通过与美国在涉及敏感及高精尖技术领域的紧密协调与政治合作,借力获取美国的技术力支持以提升自身科创能力进步。

五、日本经济外交战略性调整的制约因素

经济外交政策战略调整的持续性深化,是日本因应复杂国际变局下强化自身外交“战略主体性”的重要一环,调整的本质动因在于服务集政治、安全、经济于一体的国家综合利益的最大化诉求。但其政策实效程度仍受制于来自国际社会、利益分歧等多重政治环境因素层面的掣肘影响。

(一) 国际社会支持程度的“不确定性”

日本作为 G7 成员国中的一员,长期自负认为国际社会中维护及强固国际秩序的主体力量理应生成于“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内部协调机制。然而伴随全球化的推进发展,广大第三世界中的发展中国家日渐成为难以忽视的、能够左右国际政治变局的重要新兴力量。然而面对日本经济外交高度政治化及安全化的战略转型趋向,这些新兴力量群体实际持有的态度立场令日本存疑,从而使其相应政策的部署推进面临外部环境支持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当前全球问题日益突出、全球治理机制“缺位”的变局形势下,以“自由贸易旗手”自居的日本理应团结各方国际力量共同应对全球治理议题,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然而实际上日本却借“高标准经贸规则”说辞,拉拢欧美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对华规则博弈并意图主导新形势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日本近年来不断夯实并强化的以“民主、自由、法治、规则”为主体的价值观外交话语体系,实际是以“民主法治”为虚、“地缘拼争”为实的政治博弈口号。因而此种蕴含高度政治筹谋的经济外交施策,也就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真正认可,并助力其在“印太地区”谋夺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导权。

例如,尽管日本长期致力强化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关系及经济外交协调,但对于东盟的政治拉拢,实际收效甚微。东盟作为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组织,内部多数国家积极奉行平衡的外交政策因而不愿在印太地区陷入“选边”的战略困境。2022年11月,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东盟圆桌峰会上代表东盟发言指出:“新加坡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44]再例如对于广大处于“全球南方”地带的非洲国家,日本运用“经济外交”手段进行牵引及诱导的意图同样面临多重牵制与掣肘。一方面,冷战后日本以“西方世界”中的“发达一员”为标榜,本身长期在对外政策中忽视与非洲国家的战略关系构筑,相互关系的隔阂难以在短时间内予以抹除。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于日本及欧美所倡导的价值观理念并不热衷,

且警惕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最为关键的一点是非洲国家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表性力量,在对外行为逻辑中同样贯彻高度的独立自主且利益权衡取向,在对华政策上难以迎合、倒向日本的政治立场期待。

(二)“集团化”的经济安全合作形式反加重阵营内部的“利益分歧”

国家利益是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最主要变量,国家基于国家利益考量推进包含国际合作在内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制定。当前日本经济外交致力深化区域经贸政策及经济安全领域的“集团化”“阵营化”战略调整趋势,但这种以“排他性”为突出特征体现的“小集团”“小圈子”多边合作模式,往往在实际推进中同步面临内部利益的“分歧”“调适”难题,从而高度制约“集团化”性质的政策合作成效。

以“美日韩”经济安全合作为例:尽管美国意在借三方合作机制在东亚地区强化对华经济安全战略攻势,日本也意图通过三方经济安全合作推进自身安全及经济利益诉求,但韩国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量,在对华经济安全及技术封锁问题上存有明显政策分歧与意向“温差”。与日美两国相较,韩国芯片贸易对中国市场拥有更为强烈的路径依赖。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数据测算,过去十年韩国芯片的对外出口量高达一半以上是销往中国市场(最高点位为67%),即便截止于中韩关系出现紧张的2022年,这一数字也依然保持在55%的高位水准。^[45]因此基于强烈的经济动因,进入2023年后,韩国转而逐步摸索对华政策调整及中韩关系改善。2023年3月,三星集团会长李在镕时隔三年访问中国视察三星在天津主要生产线,释放经济界寻求改善中韩经济关系的信号。同年9月,中韩更是借助雅加达东亚峰会和杭州亚运会议程实现两国高层的政治对话及沟通协调。

再者而言,即便是在对华推进经济安全战略协调最为突出的美日双边合作领域,两国之间在对华“脱钩断链”及相互技术合作问题上,也同样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分歧”。第一,美日两国自身同样面临显著的“对华经济结构依存”困境。其中日本的困境更加体现于稀有矿产领域的对华结构依赖上,例如在稀土供应上,尽管日本从2010年后就不断呼吁减少对华的外部依赖,在此期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份额一度降低到40%,但近年又增至50%以上,^[46]依赖程度不减反升。

第二,在技术合作方面,两国同样存在“利益权衡”难题。与日本意在通过美日技术协调“借船出海”强化本国技术实力的意图相对比,美国的重要考量是在持续推进对华技术安全竞争博弈的进程中,整合并借助来自同盟国的战略协作优势,保障自身在尖端技术产业领域的突出技术优位。而为保证自身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霸权优位”维持,美国在战略利用同盟体制的同时,在技术研发环节也不惜加强针对盟友国的规制与管控。因此在尖端技术等经济安全议题上与美国进行持久捆束的同时,也意味着日本在技术研发环节的“命门”由美国牢牢掌控。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典型的例证就是在美国宣布鼓励国际半导体产业巨头“台积电”在美国建立分厂后,2021年日本也积极响应美国号召斥巨资拉拢台积电推进在熊本县设立分工厂的议程规划。但在最为关键的技术提供环节上,台积电明确表示在熊本分厂计划生产的仍是22~28纳米的成品,该技术早在10年前便已投入生产运营,而由美国出资在亚利桑那州设立的分工厂投入使用的则是更为先进的5纳米半导体技术。^[47]

六、日本深化经济外交战略调整的对华政治影响

就日本经济外交深化战略调整的对华政治影响而言,侧重地缘政治及安全战略导向的对外经济政策进一步冲击位居“低谷”的中日双边关系。在大国竞争和国内政治因素等“内外压力”的共同驱动下,近年来日本经济外交更加凸显地缘政治博弈和经济安全化的对华战略指向。首相官邸利用国内政策体制整備、产业结构政策方向调整、联合印太地区国家加强经济安全协调等手段方式,在重要战略物资和尖端技术产业领域,从全球、区域和双边等多个层域锻造深层次的对华“脱钩”态势,塑造“集团化”乃至“平行化”的国际市场格局。

日本经济外交的战略性调整推进,在严重破坏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的同时,进一步弱化中日经贸合作助力稳定整体双边关系的政治功能效果,使本就处于“冰点”的中日关系持续“低位徘徊”。在中日关系持续“遇冷”背景下,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信心也持续减退。根据2024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针对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经营情况的数据统计,在以3年为跨度的中期时间阶段内,关于在海外地区拓展业务的理想地域选择,与去年相较,印度以58.7%的得票率牢牢居于首位,中国则以17.4%的得票率从第三进一步跌至第六,且跌幅高达11个百分点。^[48]

国际变局下,处于“逆境”中的中日关系如何止跌企稳,其关键点之一恰在于复杂形势中要更应注重并审视中日经贸合作的“压舱石”定位,积极探索、扩大中日在双边经贸层面的广泛合作空间,不断释放并发挥中日双、多边经贸合作的“压舱石”效能。在相互经济高度依存的结构背景下,中日双方在产业升级、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及区域经贸合作的潜在合作空间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更趋强化。对于中日经贸合作的重要功能定位,2023年7月专程访问中国的日本国际贸易代表河野洋平也曾指出“日本经济界普遍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脱钩断链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双方应共同着力双边关系改善及亚洲地区的事务合作开展。”^[49]在两国已然走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的时间节点之际,日方更应回顾、重拾中日双方的缔约初心,面对国际复杂变局自觉纠正“经济手段武器化”的外交施策倾向,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合作,推动构建集政治、安全、经济等议题方面于一体的建设性、稳定性双边关系。

参考文献

- [1] 有賀貞,渡辺昭夫.講座国際政治の外交(4)[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
- [2] 徐万胜.战后日本的“战略援助”探讨[J].东北亚论坛,2006(3):52-56;周永生.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J].东北亚论坛,2014(1):19-27;常思纯.疫情下日本对外经济战略新动向分析[J].东北亚学刊,2022(3):56-68;刘云.日本新ODA大纲与安全保障[J].国际研究参考,2015(4):27-32.
- [3] Edward Luttwak.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How to Stop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ecoming a Third-Worl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Economic Struggle for Industrial Supremacy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34-39.
- [4] Robert D. Blackwill and Jennifer M. Harris.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 [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2016: 20.

- [5] 河合正弘.「地経学」から見る二十一世紀の世界[J].World Review, 2018(12).
- [6]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了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李晖,孙芳,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8;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7]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9-33.
- [8] 李少军.国际战略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6-35,105-111.
- [9] 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7.
- [10] Mark Beeson. Geo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BRI and China's evolving grand strategy[J].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Vol.6, No.3, 2018, pp.243-244.
- [11]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7.
- [12] 高村忠成.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協力構想と日本の立場[J].創大平和研究,1984(6):78.
- [13] 村山裕三.経済安全保障を考える——海洋国家日本の選択[M].東京:NHKブックス,2003:163.
- [14] デニス・T.ヤストモ.戦略援助と日本外交[M].渡辺昭夫,訳.東京:同文館出版,1989:32-33.
- [15] 常思纯.国家利益视域下日本新版《开发大纲》评析[J].日本学刊,2024(4):85.
- [16] 外務省.政府開発援助(ODA)大綱2003年版[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taikou.html>, 2003-08-29.
- [17] 内閣官房.環太平洋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関する包括的及び先進的な協定——第4回TPP委員会の機会における閣僚共同声明[EB/OL].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21/pdf/20210602_cptpp_sei-me_i_jp.pdf, 2021-06-02.
- [18] 内閣官房.環太平洋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関する包括的及び先進的な協定(CPTPP)への英国加入プロセスに関する閣僚共同声明[EB/OL].<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23/index.html>, 2022-03-31.
- [19] 首相、台湾のTPP加入申請「歓迎」[EB/OL].<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11210-RAUIGFYV6JOWZN4CQ7KSHFTJHU/>, 2021-12-10.
- [20] 時事通信社.IPEF始動、日本の役割重要＝米専門家・経済界[EB/OL].<https://sp.m.jiji.com/article/show/2814832>, 2022-09-15.
- [21] 細川昌彦.IPEFが目指すもの[EB/OL].<https://www.nhk.or.jp/kaisetsu-blog/400/474155.html>, 2022-10-03.
- [22] 外務省.日米競争力・強靱性(コア)パートナーシップ[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94418.pdf>, 2021-04-16.
- [23] 半導体 巨額公金で支援 経済版2+2 日米、調達多様化[N].朝日新聞,2022-07-31.
- [24] 米商務長官、西村経産相と電話会談＝IPEFや輸出規制を協議[EB/OL].<https://sp.m.jiji.com/article/show/2864635>, 2022-12-10.
- [25] 外務省.日米豪印首脳会合[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1_001186.html, 2022-05-24.
- [26] 外務省.日米韓首脳共同声明「キャンプ・デービッドの精神」[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41771.pdf>, 2023-08-18.
- [27] 外務省.日豪首脳共同声明[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10295.pdf>, 2022-10-22.
- [28]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Joint Statement On The Japan-Mongolia-United States Trilateral Meeting [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13680.pdf>, 2022-10-31.
- [29] 内閣官房.特定重要物資の指定について——「安定供給確保取組方針(概要案)」[EB/OL].https://www.cas.go.jp/jp/seisaku/keizai_anzen_hosyohousei/r4_dai4/siryou1.pdf, 2022-11-16.

- [30] 外務省. 開発協力大綱 2015年版[EB/OL].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taikou_201502.html, 2015-11-02.
- [31] 国際協力機構, ODA 見える化サイト. 海上保安能力強化事業[EB/OL]. <https://www.jica.go.jp/oda/project/VN17-P3/index.html>.
- [32] 国際協力機構, ODA 見える化サイト. サイバーセキュリティに関する能力向上プロジェクト[EB/OL]. <https://www.jica.go.jp/oda/project/1700574/index.html>.
- [33] 内閣官房.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EB/OL]. <https://www.cas.go.jp/jp/siryoku/221216anzenhoshou/nss-j.pdf>, 2022-12-16.
- [34] 外務省. 開発協力大綱 2023年版[EB/OL].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taikou_202306.html, 2023-08-09.
- [35] 日本の平和外交は変質するのか…途上国の軍を支援するOSAの展望と課題[EB/OL]. <https://www.yomiuri.co.jp/column/matsurigoto/20230411-OYT8T50114/4/>, 2023-04-13.
- [36] 外務省. 国益と世界全体の利益を国益と世界全体の利益を増進する経済外交[EB/OL].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3/pdf/pdfs/3_3.pdf, 2023-04-11.
- [37] Shaun Breslin and Helen E. S. Nesadurai. Economic statecraft, geoeconomics and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ies[J]. Pacific Review, Vol.36, No.5, 2023, pp.927-935.
- [38] 吴怀中. 日本对华安全战略: 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J]. 日本学刊, 2021(5).
- [39] 鈴木一人. 地経学の問題としての半導体[J]. Voice, 2023(7): 68.
- [40] 杨伯江. 日本政坛为何形成“一党优位”格局[J]. 人民论坛, 2018(17): 34.
- [41] 内閣官房. TPP協定の経済効果分析[EB/OL]. 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2015/pdf/151224_tpp-keizaikoukabunnseki02.pdf, 2015-12-24.
- [42] 外務省. 2020 わが国の経済外交[M]. 東京: 外務省経済局出版, 2020: 22.
- [43] 自由民主党政策調査会. 「経済安全保障戦略」の策定に向けて[EB/OL]. <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201021.html>, 2020-12-16.
- [44] 新加坡外长维文代表东盟发言: 我们拒绝在中美间选边站[EB/OL]. <https://m.guancha.cn/api/video/14043.shtml>, 2022-11-03.
- [45] John Liu and Jin Yu Young. What the U.S.-China Chip War Means for a Critical American Ally [EB/OL]. <https://www.nytimes.com/2023/09/27/business/samsung-hynix-south-korea.html>, 2023-10-01.
- [46] 日本総研, 野木森稔. 中国が圧倒的シェアを握る重要鉱物を巡る動き[EB/OL]. <https://www.jri.co.jp/page.jsp?id=106334>, 2023-09-28.
- [47] 野口悠紀雄. 補助で衰退した日本の半導体産業をTSMC誘致で救うことはできない[EB/OL]. <https://gendai.media/articles/-/91809>, 2022-01-10.
- [48] 日本国際協力銀行. わが国製造業企業の海外事業展開に関する調査報告 2024年度海外直接投資アンケート結果(第36回)[EB/OL]. https://www.jbic.go.jp/ja/information/press/press-2024/press_00110.html, 2024-12-12.
- [49] 王毅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河野洋平[EB/OL]. http://www.news.cn/world/2023-07/06/c_1129735088.htm, 2023-07-06.

〔责任编辑 许佳〕